

XIAMEN WENHUA
CONGSHU

● 第一辑

文化丛书

厦门民俗



陈

耕

吴安辉

编著



鹭江出版社

真明曰中左所同安
盛大州志地厦
也川志而止門
厦亦縣厦門志
門別志
宋育宅
曰志如志美
嘉紀名府一
禾其山志統

457.3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厦门民俗/陈耕, 吴安辉编. — 2 版.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厦门文化丛书; 第 1 辑)

ISBN 7-80533-966-X

I. 厦… II. ①陈… ②吴… III. 风俗习惯-福建-厦门市 IV. K892.4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555 号

厦门文化丛书(第一辑)

厦 门 民 俗

陈 耕 吴安辉 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5.75 印张 4 插页 132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2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533-966-X

G·381 定价: 9.9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友义 方汉生 朱天顺 朱鸣冈 许文章 陈孔立
陈文藻 陈碧笙 杨国桢 郑炳忠 黄永砥 黄守忠
谢 华 谢澄光 蔡望怀 潘茂元

主任：

李永裕

副主任：

陈照寰 李熙泰 洪卜仁

秘书长：

李熙泰 黄学惠（副）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永裕 李熙泰 陈 耕 陈照寰 张厚进 洪卜仁
黄吟军 笪林华 彭一万 傅子玖 谭南周

总 序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

厦门背倚漳泉内陆，面对台湾南洋。以厦门为交会点的这两个扇面里分布着三四千万操闽南语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袭了古老的优秀的华夏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在中原早已消失了的的文化因素。由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从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感情所产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坚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隔不断、打不烂的。

厦门据台湾海峡之津要，为祖国东南之良港，历来是台胞、侨胞、港澳同胞进出大陆之口岸，是祖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开放：一次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是被动的；一次是10多年前才开始的经济特区建设，这是主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会合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冲击、碰撞、融合，并将其冲击波在这两个扇面里辐射开去。

可以说，厦门文化就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有着自己地区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坚毅朴实，富有开拓

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厦门人民。而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厦门文化，使其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而熠熠生辉。

10多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峡形势的缓和，海外赤子寻根问祖，从文化传统上进行认同者与日俱增。当前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给予加倍的关注，广收博采，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探讨、研究，使其上升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需要，是教育海内外青年一代爱乡、爱国、热爱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需要。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发展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为厦门文化的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前景。

《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2年12月1日

序

厦门民俗是厦门文化中最具传统特色的部分。它源于先民们在开发厦门岛历史进程中先后带来的原乡民俗文化，又在走向都市化的环境条件下相互融合扬弃，适应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厦门传统民俗文化，是闽南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由于本地传统的形成仅有 300 余年的时间，它保留了浓重的闽南农业社会和漳、泉传统城市的气息，和闽南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关系；即使从本地都市生活中浓缩而来的新传统，也可以看出原乡文化的影子。当然，随着近代厦门成为闽南的中心城市，它的传统民俗又曾反作用地影响于闽南、台湾的城乡，并被海外移民带到侨居国去。同时，又改造、吸纳了台湾人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某些传统习俗。在这层意义上，厦门是闽南文化流播台湾、东南亚的一个中转站，又是闽南文化圈民俗相互交流影响的一个窗口。厦门传统民俗是连接闽南传统民俗与台湾传统民俗、东南亚闽南华侨华人传统民俗的一个环节。

因此，厦门民俗在闽南民俗文化圈内占有特定的一席之地。

陈耕、吴安辉二君搜访整理的这本书，把厦门民俗的风貌生动地展示出来，并对它的源头和流变作了扼要的解说。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相信它的出版，能够引起各界人士的兴趣，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对学术界而言，它为民俗学的研究，特别是闽南民俗文化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资料。厦门民俗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种种变故，还没有一部专门之作。本书把这一空白填补起来，虽然只是粗线条的描述，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毕竟为后继研究奠下了一块基石，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没的。

对社会各界而言，它是厦门人认识自己的民俗传统，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文化寻根的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在世人呼之欲出的“中华经济圈”、“中国世纪”行将降临之际，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有加强文化认同的紧迫感，而民俗这一心理潜层的沉淀，是最容易吸引、凝聚、团结的纽带。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是可以发挥这种功能的。

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民俗既有传承，又有演变；既有积极的因素，又有消极的成分。认识传统，尊重传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扬良除莠，推陈出新，才有可能创造出符合民情的新风俗，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厦门民俗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转折期中，传薪和发展是现代厦门人的责任。但愿此书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新的思考。

杨国桢

1993年元宵节于

厦门大学敬贤第八楼随月室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饮食起居	(12)
第一节 饮食习俗	(12)
第二节 起居习俗	(34)
第二章 人生礼俗	(41)
第一节 生育习俗	(41)
第二节 婚姻习俗	(60)
第三节 丧葬习俗	(83)
第三章 岁时节俗	(117)
第四章 信仰信俗	(124)
第一节 自然崇拜	(126)
第二节 灵魂崇拜	(134)
第三节 其他	(156)
第五章 民间禁忌	(163)
第一节 饮食禁忌	(163)
第二节 衣着禁忌	(167)
第三节 起居禁忌	(168)
第四节 交往禁忌	(170)
第五节 行业禁忌	(172)
后 记	(175)

导 言

民俗是一种极其普遍而又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形成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风尚习俗。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地域和生活环境的迥异，也会产生和形成不尽相同的风俗习惯。这就是所谓“十里不通风，百里不同俗”。

民俗的特殊功能及其重要性，很早就被人类所发觉和体会。《周礼》即提出“礼俗以驭其民”，《风俗通》更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风正俗最其上也”。历史上，每次社会大动荡之后，有作为的统治者总是注意整肃风俗，使社会尽早稳定下来。民间也有许多“走一乡问一俗”、“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之类的俗语，提醒人们对民俗的重视。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代民俗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民俗的特殊功能及其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遗存文化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虽然它容易被当作完全无足轻重、没有价值的旧风俗而忽视掉，但有的时候，却又往往意想不到地为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所震惊”。（日本大藤时彦《日本民俗学的研究》）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至少有以下五种功能：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向心功能、认识功能和娱乐功能。

民俗是一种模式，一种规范，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要受周围民俗的感染，甚至要被迫遵从一些民俗规范，然后才可能和周围

的人（包括他的家庭成员）协调一致地生活下去。比如外出工作的人，逢年过节就要回家团聚，如果不是非常特殊的原因无法回去，他的家人必然会不高兴、不满意，乃至引起家庭纠纷。甚至在一个人还不懂事的时候，就知道逢年过节便有好东西吃、好衣服穿，可以观看精彩热闹的庆祝活动，这就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一个人趋同于群体的活动。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导向作用，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

民俗又是社会稳定力，可以使社会系统有效地消除震荡和干扰。我国历史上每次社会大动荡之后，统治者总是大力鼓吹“孝道”，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得以巩固。传统风俗，尤其是喜庆节俗的热闹欢愉景象，能够造成一种社会安定感，让人们感到相互亲近，产生祥和的气氛，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民俗的这种整合作用往往是无形的、不自觉的，然而又是不可低估的。

民俗还是一种群体凝聚力。民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在异地他乡，这种群体凝聚力更为明显。我们经常见到、听到的一曲乡音令游子泪满衣襟的情景，正是这种惊人的凝聚力使然。在我们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接触中，不是也常有因几句家乡话或一曲南音、一支歌仔调，而顿然倍感亲切的情景吗？叶落归根，那无尽的乡思乡愁，其中有多少就是对家乡风俗的回忆和思念啊！民俗的向心功能常常能对人们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年以后的人。民俗是一种文化，文化的认同和归依作用，在民俗中表现得特别强烈。

民俗也是一本教科书。在许多民俗之中，往往包含着地理、历史、自然以及人生的学问。尤其是夏日榕树下老奶奶或老爷爷的民间故事、乡土掌故，还有野台锣鼓声中演出的种种戏文，传授了多少历史和哲理，启蒙多少儿童和少年！可以说，甚至在今天，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的历史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民俗活动中获得的。正因为民俗的这种认识作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科书都或多或少要把民俗作为教材。

民俗尤其有一种娱乐功能。这不仅指民俗中的民俗技艺，如歌仔戏，以及放风筝、踢毽、跳格子等等，曾给孩提时的人们带来多少欢乐！就是岁时节俗中的大碗酒、大块肉，人山人海，焰火爆竹，好戏连台，踩街游园，也给人们带来多少兴奋。一切忧烦愁苦，在那时刻都已抛到九霄之外，人人喜气洋洋。正由于这种功能，政治家必须制定法规，在这一天放假，让人们快乐，并想方设法制造热烈繁华的气氛，给人一种安定感。而军事家则往往趁这一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发动军事进攻，经济界则想方设法在这一天多赚钱。

值得注意的是，民俗的所有功能都具有两面性。无论哪一种，都可能起好的作用，也可能起坏的作用。比如认识功能，它可能教给你许多过去时代的历史知识，而同时也可能给你灌输许多封建意识。再如向心功能，它可能促进祖国统一，而在一定的前提下，也可能是导致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分离的重要原因。

总之，民俗具有多种功能，其功能具有双重性。正是这种巨大的、具有双重性的功能，使人们对民俗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不仅中国要了解世界，也需要世界了解中国；不仅要让青年一代面对各种外来文化，也需要让他们了解自己悠远的文化。对中华民俗的研究、整理、展示、传播，不仅能使人民对自己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弘扬中华文化，而且能够促进文化交流，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风俗民情，促进对外旅游事业、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并使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中华民俗更进一步丰富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

民俗虽然是这样重要，民俗研究虽然是这样意义重大，但是，把民俗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却只有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在我国，以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民俗为开端，迄今也不过 70 多年。而厦门的民俗研究，以谢云声、林惠祥等人为代表，则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在历史上，厦门的民俗研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研究解放后几乎被民间文学所替代，直到 1978 年才又被重新提起。那正是我们民族既要推进社会变革，又要增强社会凝聚；既要吸纳外来文化，又要珍重传统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民俗学迅速地播传到全中国。

这时，人们发现，世界的民俗研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俗学与文化学、语言学成为世界性的三大显学，其内涵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早期的民俗学者将“民俗”之“民”理解为农民、陋民、未受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文化较低的下层民众。按照这种观点，城市居民就不可能有民俗，知识分子不可能有民俗，受过近代文明洗礼的现代人也不可能再创造什么新的民俗。或者说，只有古老的、落后的、不开化的民众才能创造民俗，今人则不会创造新民俗，那么民俗总有一天将在人群中消亡。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各国学者纷纷抛弃了这种观念，建立了新的共识：民俗属于同一民族的，或同一区域的，或同一集体的全体民众；旧民俗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或消失，新民俗又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崛起。民俗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历史过程，民俗的整体与人类共存。正是在这新观点的指导下，近年来都市民俗学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其次，民俗的研究范围，也从狭隘的古文化残存物的圈子中

跳出来，扩大到现实社会中生机勃勃的各个方面。早期的民俗学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典礼仪式、迷信、歌谣、传说等方面，并强调指出“民俗包括民众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美国班尼女士《民俗学概论》）将有形的物质文化排除在外。这种观点对我国一部分民俗学者有相当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在界定民俗的范围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实际上，“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钟敬文先生《民俗学入门》序）现代民俗学早将诸如建筑、服饰等有形的物质作为研究对象，甚至如经济民俗学、军事民俗学、外交民俗学等交叉应用民俗学也已迅速崛起。

其三，民俗学的研究目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种把民俗学仅仅作为古代学来对待，把追本溯源，挖出最古老的形态作为最终目的的观念，已经被现代民俗学所纠正。更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民俗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民俗变迁推移的过程，研究必然变化和确已变化了的原因和规律，尽早结束长期以来民俗演化完全依赖自发调节的自然进化状态，逐步实现自觉有效地对民俗变迁的控制，移风易俗，使民俗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正向功能作用。民俗学已不仅仅可以作为古代学来研究，甚至也不仅仅属于现代学，而且可为未来学提供知识理论准备。

由于上述原因，民俗学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多门边缘学科的系统。对它自己本体结构及自身特质认识的理论民俗学也应运而生，并愈来愈引起重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手段，如电脑、摄录像等，也被大量应用于研究工作中。

与此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在研究

中，总是把民俗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把简单确定的个别现象的还原分析推进到复杂整体的有机综合，从事物整体联系和发生、发展过程来系统地考察世界，这正是科学的进步与技术发展的结果。

当我们以上述现代民俗学的观点来观照厦门民俗时，我们会发觉，厦门民俗绝不应仅仅是现有民俗事象的简单的罗列。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描述厦门民俗，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承担的。

厦门民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从它与外部的联系看，它是闽南民俗的一个部分，而闽南民俗又只是闽南方言文化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

闽南方言文化是汉文化里的一个分支，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一个区域性文化（亚文化、基层文化）。它以方言为其基本特征，其区域涵盖了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侨华裔聚居地。厦门得天独厚，恰好位于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侨华裔聚居地这一个大三角和闽南漳、泉、厦金三角两者的交汇点。如果说泉州文化曾经是古老传统的闽南文化的代表，那么厦门文化已经并正继续表现出融汇吸纳近代以来两个三角区域的所有闽南方言文化的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厦门民俗自然会同漳州、泉州、台湾等地的民俗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当然，也会有一些变异和创新。但无论有多少差异，它们同属于一个区域文化范围，其民俗文化心理是完全相同的，差异几乎全都只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比如台湾的吴沙崇拜，漳州的陈元光崇拜，泉州的清水祖师崇拜，厦门的陈化成崇拜，同安的苏颂崇拜，崇拜的对象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发自对恩泽于乡里百姓的先贤的崇拜心理。在这种民俗文化心理共通，而彼此间又关联极为密切的情况下，有许多民俗事象

也就很难严格地将其界定为仅仅是某一地的民俗。其间的互融、共通，甚至同一个事象，各自却有不同传说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从厦门民俗系统的内部结构来看，至少应该包括民俗事象、民俗理论和民俗改革实践三个子系统。或许有同志对厦门民俗系统应包括民俗理论会不以为然。但是，众所周知，厦门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以谢云声先生为先驱，以厦门大学一批学者为中坚，几十年来，厦门有一支活跃不衰的民俗研究队伍，而且成绩斐然。近年来，在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民俗志》的编撰、民俗理论的探讨、民俗知识的普及、民俗论著的发表等方面，建树颇多。福建省的民俗学会也是依托于厦门大学。因此民俗理论当是厦门民俗系统中应有的组成部分。当然，与民俗改革实践一样，它们都不是本书所要描述和介绍的。

再把厦门民俗事象作为一个系统来看，至少应包括空间系统、时间系统和分类系统三个子系统。

厦门岛上的居民，都是自唐以后历代各地方移民。《厦门志》称厦门是“五方杂居”。厦门不同于北京、泉州等历史悠久的古城，市区祖居十代以上者并不多。泉州来的移民，带来了泉州的风俗；漳州来的移民，带来了漳州的风俗。龙海、同安、惠安、南安等地的民俗，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涌进厦门。各地移民聚居厦门，共生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逐步演化，这是厦门民俗的一大特点。

由于早期各地移民，各有其相对集中的聚居点，因此各社区就有若干不同的民俗，从而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异的民俗空间。比如厦门港一带，受惠安崇武渔区的风俗影响就多一些。厦港渔民某些独特的风俗，还受职业的影响，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社区的民俗。第一码头、菜行一带，受同安的影响多一些。第五码头一带

受龙海的影响多一些。每年春季祭奠先人，有的祭清明，有的祭三月节。正月十五泉州来的吃“元宵圆”，同安来的则在“半年”和冬至“搓圆仔”。漳州来的拜“三坪祖师公”，南安来的拜“清水祖师公”。龙海来的爱看歌仔戏，晋江来的却请七子班、高甲戏。总之，闽南各县民俗都在厦门有所反映。在长期共处中产生了如下几种情况：（1）由于共同开创新生活，而产生了共有的新民俗。如“走山岩，吃空气”，便是在新的城市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新俗。（2）由于生活的变化和彼此的影响，原有的习俗变形或相互融会成为共同的习俗。如“普渡”由一村社某一特定日子的活动变为按街道轮流，彼此相互邀宴。（3）某一地的民俗被其他地移民所承认接受，成为市俗。如南安的清水祖师崇拜，同安的保生大帝崇拜。（4）还有一些比较封闭的社区，保留了一些未被多数人承认、接受的原居住地的民俗，如厦港一些居民的吃鱼不能翻动等习俗。但这些习俗往往又已与原居住地的习俗多少有些不同。（5）不适应都市生活的习俗都被废弃了。

上述（1）、（2）、（3）的情况成了绝大多数厦门居民所共有的民俗，成为厦门市俗的第一个层次。第（4）种情况则仅仅是某一社区的区俗，成为厦门民俗的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还包括近郊村落社区的民俗，如集美、海沧、杏林和禾山等地的民俗。这些近郊村落与市区最大的区别是其生活形态建基于农村农业生产，而大大不同于都市的生活。而且近郊村落里相当多数的居民是世居十几代甚至几十代，有其固有的风俗传统，与外部的交流也较少。

总之，从民俗空间来观察，厦门民俗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绝大多数居民共有的，带有鲜明的都市生活色彩的市俗。第二层次是近郊村落市镇和市内某些社区各自独有的区俗。这些区俗显然不应被排除在厦门民俗系统之外；但也很显然，它们并

不是绝大多数居民所拥有的市俗。把它们作为第二层次，作为厦门民俗空间系统中的子系统来加以区别，有利于更准确更深入更细致地观察厦门民俗系统。不过，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将只描述市俗。这不仅因为像海沧、灌口、杏林、集美，它们的民俗完全可以各自独立成篇地写成另外一本书，而且作为近郊村落市镇，它们更偏近于乡村民俗系统，而更少一些都市的特点，因而同厦门民俗有一定的差异。

至于同安民俗，那就完全不应属于厦门民俗系统了。在《厦门民俗志》的编纂中，同安民俗被划入厦门民俗中。这是以行政区划规范民俗范围的结果，是不科学的。同安民俗是闽南民俗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厦门民俗的形成，影响巨大，彼此也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毕竟人是文化的主体，厦门人不仅仅来自同安，厦门民俗不仅仅是同安民俗。作为一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都市，厦门已经有了自己的民俗。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同安民俗属于村落民俗系统，而厦门民俗属于都市民俗系统，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区域民俗类型。因此，同安民俗志应该独立编撰，不宜作为厦门民俗的一个部分来编。硬把它们扯在一起，不但会使内容庞杂芜乱，而且会掩盖、冲淡厦门作为一个都市的民俗特征。我们在这本小册子里，也是把厦门民俗作为一个闽南都市民俗来写，而不是描述厦门市行政区划里所有的民俗现象。

厦门民俗系统，从时间的角度看，还有其更为复杂的一面。

厦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民俗是个开放的体系。曲折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郑成功抗清基地、清初唯一的官方对台交通口岸、被炮舰轰开的“五口通商”口岸、“万国租界地”、“经济特区”等等）使厦门民俗的演化和变迁，远远超过闽南其他地区。本世纪初还盛行的婚俗“六礼”，现在 50 多岁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了。